



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动态的变化是货币政策的改善等其他因素导致的。

本章对迄今为止围绕全球化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做了一个较全面的综述，以供后续研究参考。3.2节综述了关于全球化与通货膨胀的联系直接证据。这些文献更加关注全球化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一问题。3.3节则讨论了从全球化到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具体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讨论了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政府行为（主要指货币政策决策部门，即中央银行的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方面争论的焦点是全球化是否改变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通常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因而决定了其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这个条件的变化被认为会影响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偏好，进而影响其决策，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终决定了均衡的通货膨胀水平。第二个方面，我们讨论了全球产出缺口和国内产出缺口对各国通货膨胀的相对影响程度。其中全球产出缺口是否对各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是争论的焦点。第三个方面，我们讨论了全球化是否通过影响生产效率从而影响通货膨胀。第四个方面，我们讨论了进口价格的变化是否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影响。3.4节总结了目前关于开放经济因素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的文献。3.5节做出了小结。

3.2 全球化和通货膨胀的联系直接证据

Romer (1993) 利用 1973—1988 年 114 个国家的数据对通货膨胀和贸易开放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 OLS 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的上升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这一结果对发达工业国家并不显著。Romer (1993) 认为这可能是小样本误差所致。Lane (1997) 指出 Romer (1993) 的回归遗漏了一个重要的



控制变量，即国家的大小（关于其理论原因参见 3.3 节）。利用和 Romer（1993）一样的样本，Lane（1997）发现在控制了国家规模（以总收入为代理变量）因素之后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变得更加显著了。更重要的是，这一结论对发达工业国家也成立。Romer（1993）意识到利用 OLS 估计得到的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可能是有偏的。因为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政策可能都是政府选举这样的政治原因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开放度是内生的，OLS 估计得到的参数是不可靠的。

为此，Lane（1997）利用贸易开放度指标衡量贸易开放。这一指标是用进口占 GDP 的比例对一些地理和政策因素（关税）回归得到的预测值构建的。Lane（1997）认为用这一指标度量贸易开放度并进行回归可以避免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然而关税作为一个贸易政策指标包含在贸易开放度指标中，这可能导致贸易保护和高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倒置，从而对 OLS 的结果产生影响。

Badinger（2009）用基于纯地理因素的引力模型预测贸易开放度并以这一预测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他认为这一指标与贸易政策因素是无关的，因此可以解决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利用 91 个国家 1985—2004 年的数据，Badinger（2009）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显著抑制作用是存在的。但是这一结果在 OECD 子样本中却不成立。Badinger（2009）认为这表明由于中央银行机构改革，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解决。这一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在 3.3 节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Terra（1998）认为 Romer（1993）的结果只适用于高负债的国家。他认为贸易开放抑制了高负债国家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动机，除此之外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Gruben 和 Mcleod（2004）利用 118 个国家 1972—2000 年的数据进行了 SYS-GMM 面板估计，发现控制负债率并不影响贸易开放度的显著性，并且贸